

文化遗产与“遗产化”的批判性观照^{*}

●〔德〕克里斯托弗·布鲁曼 文 吴秀杰 译

摘要：文化遗产涵盖了在一个社会中被认为古老、重要、值得保存的遗址、物品和实践活动。当前，这一题目在世界范围内正日益吸引着普通大众和学术界的关注，它的概念范围也在日趋扩大。许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强调其能够支持族群、国家和精英层利益诉求的功能，不过也有人指出文化遗产具有创造性的、反霸权的层面。本文客观性地综述了西方学界对如下问题的讨论：文化遗产与旅游业和乡愁的关系、不和谐/负面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与宗教、乡村与都市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的相关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公约。作者着重指出：个人层面上对文化遗产的依恋是一个迄今为止少受关注，却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话题。

关键词：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化；批判性观照

文章编号：1003-2568(2017)01-0047-07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作者：克里斯托弗·布鲁曼(Christoph Brumann)，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马丁·路德大学客座教授。

译者：吴秀杰，博士，自由译者，旅德社会人类学学者。

DOI:10.16564/j.cnki.1003-2568.2017.01.007

文化遗产通常指遗址、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物品、实践活动、知识以及其他为某个群体或社会认定为古旧、重要因而值得由专门机构对其进行有意识保护的事项。构成文化遗产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只能是从总体文化财富当中遴选出来的一部分。“遗产”的原本词义是指个人或者集体层面上的财物继承，扩展到“文化遗产”层面上的应用则是相当近期的发展。就总体而言，人类学比较少地将“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来使用，更受青睐的则诸如文化、物质文化或者表演文化等概念。

文化遗产受到的关注在日益增加。很多评论者声称，西方社会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股“遗产热”甚或一种“遗产崇拜”。这包含了概念上的扩展：那些从前被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如加油站、干草房或者日常餐具也具有了遗产的身份。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成了一个新类别，它包括表演、手工艺以及诸多非长久性的东西，比如文化空间，甚至连数字遗产也被提及。参与进这一

进程的，不光有民族国家、地方社区和公民社会组织，也有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这类国际性机构，它们将遗产话语和实践扩展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保护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道义责任得到普遍认可。

一、不同学科视野下的文化遗产话语

涉及文化遗产的文字产出多得难以计数，但学术研究还大多只限于艺术史、建筑学和考古学领域中，关于遗产对象本身以及对它们进行保护和展示时遇到的实际问题，比如文物修复技术、管理运作或者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在西方社会，——译者加，下同)博物馆研究早已经自立门户。社会科学对这些应用领域也有着微薄的贡献，比如探讨博物馆和展览所传达的社会信息、对文化物品进行估价，或者间接地培养活跃在博物馆和文物保护领域的人才(比如民族学博物馆的策展人在人类学专业获得学位)。

下文涉及的是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和现

^{*} 本文英文稿由作者提供。

代史学界对文化遗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的基础研究,以及对文化遗产原生状态——不在室内博物馆或者档案馆内的保护工作。这也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领域。新培训中心以及跨学科的“世界遗产研究”规划、学术期刊,如《国际遗产研究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ritage Studies*)和《国际文化财产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都像雨后春笋般出现。“批判性遗产研究学会”(Association of 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举行的首次会议(2012年,瑞典哥德堡),收到了500篇参会论文,是预期数量的5倍,而且其中的多数并非出自应用研究的视角。

在这一新研究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针对某些特定遗产对象或者一般意义上“遗产化”的批判性观照,指出在官方的、大多为欢呼式话语与实际的历史轨迹、选择性遗忘、真正的动机——这通常是商业化或者集体性自我提升之间的鸿沟。在这些分析中经常会看到四种预设,笔者曾经将其总结为伪化(falsification)、固化(petrification)、虚化(desubstantiation)、闭化(enclosure)。人们经常以一种理应如此的方式将某些地点、物品或者实践标记为文化遗产,这被认为是在伪造“真实的”历史,固化文化遗产,使得它们不再如那些更为普通、未被标识的文化那样自由发展;将其从原本的价值和意义中剥离,只留下一个遗产的标签,声称它为某个特定的共同体、族群或者宗教群体、阶级或者国家所拥有,因而将其他群体排除在外。当前的批判性遗产研究的奠基人,比如地理学家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和文化史学家休伊森(Robert Hewison)也持

有同样的推测。在《传统的发明》一书中,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揭开了苏格兰裙的神话,让人们看到军团、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一对诡计多端的兄弟、一位嗅到商机的布料制造商共同推波助澜,将一位英格兰人在18世纪的造物转化成一桩恒久的苏格兰身份认同标记。人类学学者也像历史学家一样,做了很多类似的个案研究,剥开在受到美化的官方传统之下的那些真实的历史理念,即霍布斯鲍姆对于“风俗”“真正的传统”与“被发明出来的传统”之间所做的区分。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对于传统经验而言,文化实践的源起大多无关紧要。本真性总是在当下中被界定。将某些东西界定为是‘传统的’,并非取决于其往昔性或者既成性。‘传统的’更多是一种任意的符号性指定,更多是一种指定的含义而不是一种客观的质性”。但是,尤其是在本土权利诉求方面,这样的相对主义立场被证明是很难以为继的。

考古学家史密斯(Laurajane Smith)提出的那个被广为引用“权威性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简称为AHD)表述,也包含了上文提到的那四种常见的预设。Smith也认为,遗产并非简单地存在,而是经由社会实践来构成的。“权威性遗产话语”及其为了让后来人受益而抢救过去(毋庸说,这些定义都很模糊)的诉求,服务于中、上层阶级的利益和民族主义的召唤,其主要功能在于强化专家和机构对相关遗产的控制。这一趋势得以通行甚至也有悖于专家们的善良本意,让漠视专门知识技能、否认那些非专家类文化遗产传承者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体力劳动

① Christoph Brumann, "Outside the Glass Case: The Social Life of Urban Heritage in Kyoto." *American Ethnologist* 36 (2009): 276-299.

② David Lowenthal,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David Lowenthal, *Possessed by the Past: The Heritage Crusade and the Spoils of Hist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Robert Hewison,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London: Methuen, 1987.

③ Richard Handler and Jocelyn Linnekin, "Tradition, Genuine or Spuriou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97(1984): 273-290.

④ James Clifford,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th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277-346; Allan Hanson, "The Making of the Maori: Culture Invention and Its Logic,"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1 (1989): 890-902. Allan Hanson, "Reply to Langdon, Levine, and Linnek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3 (1991): 449-450.

⑤ Laurajane Smith, *Uses of Herit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者或者原住民等这些底层人群)的情况蔚然成风。

不过,也有学者对纯粹的解构性分析发出警告,并看到传统与文化遗产社会角色中好的一面。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就是带着功能学派的态度来看待那些对传统的发明,他把日本著名的文化遗产相扑作为分析范例:现代相扑的外观形式肯定出自19世纪,至于能否将其阐释为这是“一些群体在着意于攫取权力、物质获取、抗拒或者身份认同时所需要的”,萨林斯表示质疑。他更倾向于,“现代相扑明晰地展示了旧有的形式和关系;它可能被重新发明来符合新情境,但是这更应该被理解为标记了其内在活力而非衰落”。因而,在萨林斯看来,“传统的发明性”(inventiveness of tradition)才是一个更为适当的用词;回过头来看,也许 Terence Ranger 会更愿意用的说法不是“对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而是“传统造成的发明”(invention by tradition)。人类学家蒂利(Christopher Tilley)也认为,这类创造性本身就是其传统性的一项标志。他细致地解构了所罗门群岛上瓦拉人(Wala)给旅游者设计的一套仪式表演,让读者看到:这种拼装(bricolage)遵循着非常传统的美拉尼西亚人方式,将本土与外来文化资源重新组合进新形式当中。那些所谓对文化遗产所进行的政治性保存也遭到质疑。历史学家塞缪尔(Richard Samuel)着重指出,保存文化遗产的行动受制于政治情况而变化无常,“在非常短的时段内不得不做出令人触目惊心的反转”。所有这些都表明,应该对细节予以更多的关注。

二、遗产化与遗产管理中的多重声音

许多实地研究也在力图揭示围绕文化遗产的多重声音和利益,它们不但聚焦官方代言人和

官方话语,而且考虑到那些底层、非官方、本土的视角。人类学家提供的深层民族志研究尤为值得一提。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在其对希腊克里特岛一个小城罗西姆诺(Rethemnos)的研究中,提出了要将“不朽时间”(monumental time)和“社会时间”(social time)区分开来:前者隐含在政府对旧城中心那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建筑物的保护当中,后者则存在于当地居民及其日常生活当中。乔伊(Charlotte Joy)的田野调查点是在马里的城市杰内(Djenne),她发现这里的泥土建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由此而来的相关规定却给这些建筑物的居住者带来巨大的挑战。这些建筑标志了法国殖民地浪漫主义的遗风,而马里政府也乐于在全球文化地图上插上一面自己的小旗子,于是政府对这些泥土建筑强行实行保护措施以利于吸引观光客,旅游业也是这里为数不多的收入来源之一。但是,要对房屋定期刷泥浆所耗费用要超过采用不那么“本真”的砖石墙,在一个连下水道等基础设施都缺乏的重度贫困地区,许多居民感觉到呵护传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此外,在分配文化遗产保护所带来的收益方面,严重不均等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人类学学者对此也有不少深度的描写。

在很多地方,旅游业是围绕着文化遗产的政治经济中的一股主要力量,是有意识地重新安排文化实践的一项核心动机,组织者、表演者和旅游者经由设定的互动而合作生成“游客现实主义”(tourist realism)。威尔克曼(Volkman)在分析苏拉维西人(Sulawesi)的葬礼时,提出了“编辑文化”(cultural editing)这一说法:这些葬礼被缩短,有着齐整的顺序,全程有解说,没有血淋淋的牲祭场面。这些仪式性细节虽然有改动,但是葬礼对身份地位的重要性体现为当地人和外来观光

①② Marshall Sahlins, "Two or Three Things that I Know about Cultu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5 (1999) 399-421, p.407, pp.408-409.

③ Christopher Tilley, "Performing Culture in the Global Village,"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17(1997) 67-89.

④ Raphael Samuel, *Theaters of Memory: Past and Present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4, Vol.1, p.303.

⑤ Michael Herzfeld, *A Place in History: Social and Monumental Time in a Cretan Tow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⑥ Charlotte Joy,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Management in Mali: From UNESCO to Djenne*, Walnut Creek, California: Left Coast Press, 2011.

⑦ Toby A. Volkman, "Visions and Revisions: Toraja Culture and the Tourist Gaze," *American Ethnologist* 17(1990) 91-110.

者的在场——却一直是主导性因素。马丁内斯(Martinez)对日本的一个潜水采珠村的调研表明,符合游客期待可能是一种策略,为的是从中获取所需的资源以便能继续实行那些有意避开展示的传统仪式。康莫罗夫夫妇这对人类学伉俪(John Camoaroff 和 Jean Camoaroff)则在工具性之外提出一个全新的立场:他们从美国本土和南非的诸多个案出发,认为商业化以及为观光客进行表演恰好能促使当事人将本真的、得到敬重的文化遗产列于首位。布鲁纳(Edward Bruner)对亚伯拉罕·林肯故居的露天博物馆的研究表明,旅游者面对文化遗产的主导性话语并非毫无抵抗能力,参观者看重那些经常超乎意料的质量,也能以游戏或者讽刺的方式来对待它们。

一些学者将怀旧情绪认定为遗产化和遗产旅游后面的一股主要力量。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怀旧情绪中那些感伤的、乌托邦式的潜在因素当中,也总是包含着对当下处境的批判。也许我们对此应该有更为细致的区分,比如 David Berliner 就区分出真正经历了过去的“内-怀旧”(endo-nostalgia)和西方旅游者、保护专家和 UNESCO 的官员的“外-怀旧”(exo-nostalgia),近年来这两种“怀旧”都加之于老挝的琅勃拉邦以及那里的佛教寺庙和殖民地时期的别墅。他也强调,在老挝王国的旧都里有些“怀旧”实际上是一种转变的力量,而不是要保存物品。

然而,遗产保护也可能出于完全相反的怀旧

动机,那是一种要保留对历史事件和境况的记忆以免其重新出现的愿望。这些“痛苦与耻辱之地”也被称为负面遗产,它们在当代遗产管理中所占的比重在日益增加,比如在 UNESCO 的世界遗产名录中列出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的和平纪念碑、比基尼岛的核试验基地。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对德国纽伦堡纳粹党代会场地的民族志研究表明,这类遗址地的意义也往往受制于不间断的协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若干年里,当地人不愿意提及此处,因为许多当地人(那些传统上倾向于左派的人士)感觉到这不公平地将他们与纳粹遗产绑定在一起。但是在两德统一以后社会思潮有所改变,枉担力图否认历史罪恶的嫌疑是人们最不愿意接受的情况,于是当地人不再回避这一遗产。梅斯凯尔(Lynn Meskell)已经在思考一类含义暧昧的特殊遗产,呼吁公众讨论如何去阐释、保留和存档“9·11”爆炸遗址上的过去存留以及那座被阿富汗塔利班炸毁、如今空空如也的巴米扬大佛的佛龕,即这些意图明确的、公开的摧毁。在这些标志性的大行动以外,被列入名录的遗产也会在各地引发一定的毁坏行为,这些行为被阐释为是在抵制遗产规范中的新殖民主义因素。

此类争执可能源自这一事实:列入文化遗产名录中的物品与实践活动可能保留着更为古老的含义,与我们在“虚化”中所期待的内容相反。这些新旧含义可能会是一种和谐的共存,比如日本京

① Dolores P. Martinez, "Tourism and the Ama: The Search for a Real Japan," In *Unwrapping Japan: Society and Culture i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E. Ben-Ari & B. Moeran & J. Valenti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97-116.

② John Comoaroff & Jean Comoaroff, *Ethnicity*, In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③ Edward M Bruner, "Abraham Lincoln as Authentic Reproduction: A Critique of Post-modernism,"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96(1994): 397-415.

④ David Berliner, "Multiple Nostalgias: The Fabric of Heritage in Luang Prabang(Lao PDR),"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8(2012): 769-786.

⑤ 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奥斯威辛集中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以警示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2006年3月,波兰(遗产项目所在地)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将其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奥斯威辛集中营”更名为“德国纳粹奥斯威辛-比克瑙集中营”,英文的完整表述为“Auschwitz Birkenau, German Nazi Concentration and Extermination Camp (1940-1945)”,以强调这是德国纳粹所为,2007年6月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了这一更名申请。——译者注

⑥ Sharon Macdonald, *Difficult Heritage: Negotiating the Nazi Past in Nuremberg and Beyo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⑦ Lynn Meskell, "Negative Heritage and Past Mastering in Archaeolog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5(2002): 557-574.

都的京町式房屋和祇园祭都成为得到高度首肯的文化遗产,作为漂亮、氛围良好、生态和谐的居住地,作为能带来节日乐趣、娱乐和获得超自然保护的场所,它们一直对人们有吸引力。但是不可避免的是,尤其是在“遗产化”与该遗产的宗教重要性这一问题上,经常会出现关系紧张的情形。

文化遗产带来的后果是悲是喜,也取决于该遗产的所在地或者该遗产被设想为应归属何处。在现代国家中,农村、乡村民众及其传统风俗往往被用来投射人们对原生整体性以及未受到污染的价值观念的渴望——这种渴望常常来自这些地方的民众自身,而非城市人或者知识阶层。本文作者在研究日本大城市京都的文化遗产时提出了这样的假设:城市文化遗产不那么容易被外来者所劫持,由于财富、权力和思想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市,这让城市居民有更多的防卫能力。

对于文化保护工作的演进已经有人做过综述,学者们也开始对那些自民族主义的“漫长的十九世纪”以来得以长足发展的西方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做批判式社会史研究。然而,对于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性安排、其核心理念、社会组织以及宽泛背景等问题的全方位分析,仍然付之阙如。关于国家层面上的遗产保护机构,已经有些学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以日本首当其冲,因为这是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非西方式文化

遗产保护体系。梅斯凯尔(Lynn Meskell)解构了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eger National Park),展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大自然旅游业以及生物多样性的霸权如何导致了对公园中许多考古学遗址和岩画艺术遗址的忽略,也就是回避掉种族主义和驱逐的痛苦历史。她是一位从事现场挖掘工作的考古学家,敏感地去关照自身工作的大社会背景以及遗产话语的卷入,像她这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多。

三、全球遗产的标准化与批判性研究的路径

一个国家到底如何处理其文化遗产,越来越依靠外来的行动主体。这包括各类基金会,如盖蒂基金会、阿迦汗基金会或世界文化遗址基金会,也包括诸如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所订立的公约和所采取的行动,包括诸如世界银行或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提供的资助。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其各种公约让自己成为全球遗产标准的最高仲裁者,是国家和地区性规则的推手。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仍然知名度最高、最受青睐,其目标是保护其久负盛名的名单上那近1000个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自然遗址和文化遗址。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责难使得更多的民间

① Christoph Brumann, "Outside the Glass Case: The Social Life of Urban Heritage in Kyoto," *American Ethnologist* 36 (2009): 276-299.

② 同上,另见 Christoph Brumann, *Tradition, Democracy and the Townscape of Kyoto: Claiming a Right to the Past*, London: Routledge, 2012.

③ Jukka Jokilehto, *A History of Architectural Conservation*. Amsterdam: Elsevier Butterworth-Heinemann, 1999.

④ Melanie Hall ed., *Towards World Heritage: International Origins of the Preservation Movement 1870-1930*,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1; Astrid Swenson, *The Rise of Heritage: Preserving the Past in France, Germany and England, 1789-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Astrid Swenson and Peter Mandler eds., *From Plunder to Preservation: Britain and the Heritage of Empire, 1800-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⑤ Regina Bendix, Aditya Eggert, and Arnika Peselmann eds., *Heritage Regimes and the State*. Göttingen: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2012; Brigitta Hauser-Schäublin ed., *World Heritage Angkor and Beyond: Circumstances and Implications of UNESCO Listing in Cambodia*. Göttingen: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2011.

⑥ Christoph Brumann and Rupert A. Cox eds., *Making Japanese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10; Barbara E. Thornbury, *The Folk Performing Arts: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Jap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⑦ Lynn Meskell, *The Nature of Heritage: The New South Africa*, Malden, Massachusetts: John Wiley & Sons, 2012.

⑧ Anna Karlström, *Preserving Impermanence: The Creation of Heritage in Vientiane, Laos*, Ph.D. Dissertation, Uppsala University, 2009.

建筑、文化景观、有歧义阐释的遗产以及自觉的“人类学”视角日益体现在遗产名录当中。对这一遗产名录的不满之声也在日益增大。尽管如此,尤其是那些来自南半球的后来者,现在也如北半球的国家一样,娴熟地将自身国家的利益推进到这一领域当中。

这一问题带来的结果之一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不仅要注重遗址,也要关注工艺、表演艺术以及类似的文化现象。其最初的举措便是2001年发起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计划(The “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 Programme),而后在2003年通过了完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世界遗产曾经被普遍认为是建筑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地盘,而在这一新进程里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进入评委会、顾问委员会和决策团当中。由于民族国家都热衷于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一评选模式在国家层面上被复制,所要求的制度性框架目前已经成形。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管理机构也同样列具名录,一部分所列项目是在相当程度上依照惯常的民俗学标准来入选的,一部分则是非常泛化的——探戈舞(阿根廷和乌

拉圭联合申报)、法国美食大餐、诺鲁兹新年(阿塞拜疆等七国联合申报)。当代人类学家对于文化有更为动态的看法,他们更多地看到持续改变的景观而不是切割整齐而稳固的组装,因而他们对这一做法的学理价值有所怀疑,但是有些人也承认这一做法为提高赋权和改进文化保护提供了可能性。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地理学家追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制度性进程及其演进,一些学者则代表他们的国家完全参与到这一领域当中。最近也有一些跨学科的文集试图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象。由于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尚处于成形阶段,其未来命运和发展轨迹还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在全球层面上的制度化和政治化以外还有一个不变的事实:许多人感到,去关注作为文化遗产的物品与实践也是一种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对这些人来说,文化遗产的标签意义有限,他们从中追寻的历史质性(historicity)与文化遗产话语有所不同。比如,对于京都的那些节日参与者来说,令他们动容的不是某些器具的年代久远,而是节日作为传承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而这个链条可以追溯到若干世纪以前。这种个人层面上的依托情感,还没有被系统性地探讨过,尽管麦克拉克肯(Grant McCracken)对“策展人式的消费者”(curatorial

① Christoph Brumann, “Unser aller Kulturgut Eine ethnologische Annäherung an das UNESCO-Welterbe,” *Sociologus* 61 (2011): 19-43; Lynn Meskell, “The Rush to Inscribe: Reflections on the 35th Sess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UNESCO Paris 2011,”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37 (2012): 145-151; Thomas M. Schmitt, “Global Cultural Governance: Decision Making Concerning World Heritage between Politics and Science,” *Erdkunde* 63(2009): 103-121.

② 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 “Intangible Heritage as Metacultural Production,” *Museum International* 56(2004): 52-65.

③ Michael F. Brown, “Heritag Trouble: Recent Work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Proper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12(2005): 40-61.

④ Chiara Bortolotto, “Globalis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etween International Arenas and Local Appropriations,” in *Heritage and Globalisation*, edited by S. Labadi & C. Long,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97-115; B. Rudolff, “Intangible” and “Tangible” Heritage. A Topology of Culture in Contexts of Faith, Bonn: Scientia Bonnensis, 2010; Thomas M. Schmitt 2008.

⑤ Valdimar T. Hafstein, “Intangible Heritage as A List: From Masterpieces to Representation,” in *Intangible Heritage*, edited by L. Smith & N. Akagawa, 93-111. London: Routledge, 2009; K. Kuutma, “The Politics of Contested Representation: UNESCO and the Masterpiece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Prädikat “Heritage”: Wertschöpfungen aus Kulturellen Ressourcen*, edited by D. Hemme & M. Tauschek & R. Bendix. Berlin: Lit, 2007.

⑥ Lourdes Arizpe ed., *Compartir el patrimonio cultural inmaterial: Narrativas y representaciones*, UNAM, CRIM, México: Conaculta, 2011; Chiara Bortolotto ed., *Le patrimoine culturel immatériel: Enjeux d’une nouvelle catégorie*, Paris: Maison de Sciences de l’Homme, 2011; Laurajane Smith and Natsuko Akagawa eds., *Intangible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09.

⑦ Christoph Brumann, *Tradition, Democracy and the Townscape of Kyoto: Claiming a Right to the Past*. London: Routledge, 2012, p.239.

consumer)的粗线条勾勒曾经指出了这条路径。在所有的工具化意图考虑之余,持久之物——能抗拒改变,存留时间超过我们的生命长度——在许多社会的许多人当中都能引发敬畏之心。这里便提出关于泛人类的“对于潜层物质性的渴望”这一基本哲学问题,并开启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将文化遗产与物质性、表演性、永久性/非永久性之理

念等层面上更宽泛的背景以及特定文化中的感情方式连在一起。至于情绪因素,遗产批判研究者也许应该首先去考虑自身的情绪,包括他们自身在机构中的位置以及文化遗产项目从机构中获得的资助——这些机构行为都以对文化遗产带有某些企图为前提,而这些正是研究者要带着批判性眼光去解析的内容。

- ① Grant D. McCracken, *Culture and Consumption: New Approaches to the Symbolic Character of Consumer Goods and Activit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4-56.
- ② Lynn Meskell, "Negative Heritage and Past Mastering in Archaeology,"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5(2002): 557-74, p.559.
- ③ Anna Karlstrom, *Preserving Impermanence: The Creation of Heritage in Vientiane, Laos*, Ph.D. Dissertation, Uppsala University, 2009.

《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目录(总第131期)

学术前沿

- “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 周星
- 日常生活的未来民俗学论纲 高丙中
- 论“生活世界”与民俗学
——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谈起 王欣
- “传统的发明”的超越与传统多样性的敬畏 齐钊
- 缺失的理论 [美]爱略特·奥林著 马丹丹 胡玉福 陈健译

民俗史

- 蛇噬蛙纹饰器物分析 魏泽华
- 由两汉镜铭看汉代西王母“宜子孙”功能 张清文
- “魂人”礼俗与北魏文化认同 段锐超 段元秀
- 利玛窦世界地图中的“海外赢虫”
——兼论市民文化与晚明世界观的塑造 刘捷
- 精神性存在的让渡:旧京的庙会与庙市 岳永逸
- 宗教背后的杀戮:希腊献祭仪式研究 [德]瓦尔特·伯克特著 吴玉萍译

民间文学

- 论民间故事的“改写” 刘守华
- 蒙古语“猴”词源考 呼斯乐
- 《苗族史诗》中民俗事象翻译的民族志阐释 王治国

民俗观察

- 都市化村庄的公共生活、“二元时间”与地方节奏
——以珠三角宁村为个案的分析 李翠玲
- 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生成与当代价值构建
——济南历史建筑的哲学诠释学解读 王姗姗 傅永军
- 创新社会治理与社区文化建设
——基于“清河实验”项目的一些思考 赵娜
- 公众参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路径选择
——以云南大理洱海为个案的研究 陈爱国
- 《民俗研究》2016年总目录 (152)

主编 张士闯
邮发代号 24-095

社址 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A区1820室
定价:15.00元
电邮 msysjbjb@126.com

邮编 250100